

中国古代的书法家，卓有成就传诸后世者，除了张旭这样极为特殊的个案，大多在官人，半在文人。书法在古代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爱好。读书人手中的毛笔，就像现在学子手中的电脑键盘，是一种书写的工具，首要的作用在于表达而非艺术。但毛笔与电脑毕竟不同。电脑借助科技而复杂、便捷，毛笔借助心灵而律动、飘忽。

忠学先生是官人出身，早期从事科研，中年后改为行政。从经历上看，他似乎与书法无缘。因为到了现代，书法已成为一种职业，几乎与官人文人脱钩了。尽管现在有所恢复，但更多的官人，仍无法对毛笔建立感情。忠学先生对书法的热爱，可以追溯到童年。他与司马迁是同乡。那片三秦大地的黄土高坡，对于庄稼而言，是瘠地；对于文化，却是一片难得的沃土。那里的人，无论是目不识丁的老农还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对文化都保有足够的敬畏，对文化人更是尊重非常。这样一种传统，对忠学先生的影响甚巨，这就是他喜欢书法并兼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原因。

他的字，早期端正谨严，这是童年临帖的结果。一个人书法的根基，大抵应在十五岁前铸就，所谓童子功是也。自青年而中年，忠学先生远离了狼毫与羊毫，不是感情上起了变化，而是时代风气的改变。五十多岁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他对笔墨线条的追求不再被斥为不合时宜，他的少年时代的爱好才又重新萌动。

细观他的书法作品，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童年临帖而产生的字幅，一撇一捺，谋篇布局，皆有来历；二是晚年求变而开创的作品，貌如枯木，线条如

每月月中旬，我会带着些食物和日常用品去本城东北角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看望朋友。那里被分隔成许多小间，仿佛每个“盒子”里都足以蛰伏一个沉默的灵魂——他已窝居了半年多，说是在写长篇小说。

小心翼翼顺着台阶通过逼仄的甬道，板壁上的水渍好似懵懂少年的涂鸦。尽头的那间房门紧锁，从入口处就一直警惕地注视着我的“包租婆”说他已经搬走了……不知那部小说是否完稿？他的文字如他的年龄般青涩，估计即便完成了也很可能是一文不值的习作。为何突然想到用“一文不值”这个词？难道表明我早就被经济时代强大的评判力量所同化，不知不觉变成了年少时嘲笑的那种世故的中年人？

类似的“文艺青年”上世纪80年代有不少，那时我尚在读高中，也喜欢文学，心甘情愿沉迷于瞬间即逝的灵感，并为触摸到某种模糊而神秘的信念感召而兴奋。现在想来，其实仅仅与荷尔蒙分泌有关，只是青春期必经的阵痛罢了。最后，社会课堂迅速使我明白如果不花些心思与技巧妥善打理世俗的困扰，完全沉浸在精神世界中是愚蠢的执迷，尽管看上去有些可爱。

曾与一位前辈作家彻夜饮酒，尚且单身的我流露出对当年文学能改变个人命运的眷

他已踏上山阴道

熊召政

蚯，大有古意。窃以为，忠学先生书法的这两个阶段，前者情理兼容，理胜于情；后者兴趣并茂，趣在兴先。后阶段的字从美学上以四字概括，可称抱残守拙。

从行政的角度论，抱残守拙肯定是平庸的官员，可能会遭百姓的耻笑。但是，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抱残守拙应是难得的境界。

日本的书法家，并不欣赏尽善尽美。一幅字中，故意留下数处败笔，大有“无败不成书”的追求。粗略观之，会觉得有些可笑，哪有真正的艺术品会留下瑕疵的？但仔细一想，还是大有道理。古人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所景仰的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有谁是十全十美呢？到了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地步，琉璃球儿似的，肯定没有人喜欢，是真君子首先必有真性情。有了真性情，焉能没有毛病？有了毛病，就等于书法中有了败笔。这个败笔，就是残，就是可爱之处。

说了残，再说拙。

从字面上理解，拙就是不美丽、呆板。时下有一种书风，就是以丑为美。故意把线条弄得歪七竖八，字写得歪瓜裂枣。时人以拙誉之，大谬矣。凡书法能称拙者，必定是既让人从中看不到烟火气，又让人感到内敛的沧桑感。所谓拙，是既不见甜腻的馆阁，亦不见粗俗的头巾；处庙堂而不见横霸，处江湖而不见草莽。此是上乘功夫，不面壁十年，焉能获得？

忠学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悟到了书法的真境界，把“抱残守拙”四字奉为书道的圭臬。不是说他已步入化境，至少，他已踏上了山阴道，于丛柯交复、莺啼燕啭的书法江南，从容体会艺术的真谛。

恋——有人靠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小文居然找到了老婆。谁料到，前辈突然把酒杯重重一放，正色说道：那时对文学的推崇是历经十年黑暗时期后精神荒芜，急需寻找思想食粮的结果！顿时，轻率和蒙昧令我羞愧不已，美酒也变了味道。

如今的艺术作品很少令人产生仰望星空的浩荡情绪，继而触及信仰善根的力量。经济时代的心灵特征之一是无法抑制将知识、艺术、权力，甚至情感等一切换算成投资回报率的冲动。在半个多世纪没有诞生过哲学家的土地上，难免缺乏对信仰的敬畏。相对当下的人文环境而言，或许也可以视作历史的阵痛期吧。

好在历史是慈悲的，它具备奇特的修复功能。我再次从一位年轻朋友那里发现了某种修复的细微迹象，纵然当事人无意识的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小说的成败已不再重要，可贵的是记载了青春岁月中的一场全心付出。他的去向或许就此成谜，也可能放弃继续探索，但至少品尝到了敢于选择独立人格的甘苦。

走出地下室，走进城市金秋的阳光里，无心期待汇入川流不息的人潮。当我们的身心总有一天会由于无法承受人类发明的各种娱乐节目和感官享受，逐渐转而探寻和捕捉内心深处的光芒，于是，“喜悦”与“和谐”的花朵才会绽放。

现在，沉静下来，找到喜欢的等待方式，学做一星别致的尘埃。然后，缓慢地修复……

书法

侯申江



我最初耳闻粟裕司令的英名，是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那段时间，在“学协”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得悉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粟司令韦岗伏击打得鬼子死伤狼藉，大为振奋，我就从上海去参加了新四军。

我第一次目睹粟司令的风采，是1941年秋在抗大苏中大队听这位名将作报告。粟司令讲着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内容丰富，语言生动。领导上要我做记录，而我往往听得入神忘了手中动笔。

我留在抗大九分校工作时，粟司令兼校长，调一师师部、苏浙军区司令部时，粟司令

风华正茂（中国画）施祖铨



清代作家、戏曲家李渔(1611-1680)

是一位“痴情”嗜蟹者，从他《闲情偶寄》谈蟹短文中，即可看到他的蟹癖之深。他坦言自己“独于蟹螯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说“予嗜此一生，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钱为‘买命钱’”。他把蟹多量上市的农历九月、十月称为“蟹秋”，为了抓住时机，他要求家人及早酿好酒，洗净陶瓮，尽可能多买回蟹，予以“糟之醉之”，并给它们取专名：蟹糟、蟹酿、蟹瓮，而把操作洗蟹、糟蟹的佣人称为“蟹奴”。

对于蟹的烹饪和食用，李渔格外讲究。他认为“以之为羹者，鲜则鲜矣，而蟹之美质何在？以之为脍者，腻则腻矣，而蟹之真味不存。更可厌者，断为两截，和以油、盐、豆粉而煎之，使蟹之色、蟹之香与蟹之味全失。”他主张“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自食”，并且，食蟹“必须自任其劳，旋剥旋食有味”。

李渔对蟹的色、香、味之评价，达到“至极”的程度，他说：“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可见，李渔嗜蟹成为其“饮食中之痴情”，其来有自。

浪淘沙

电视剧《吴承恩与西游记》热拍

宋连庠

正值丁亥本命年的“美猴王”六小龄童，深夜自横店影视城来电云：“他一人饰两角的神话连续剧《吴承恩与西游记》，正在热拍，又说七三高龄的牛犇(原名张景学)亦在剧中友情出镜。祝其剧拍摄圆满成功！”

妙肖两“猴王”，夙愿终偿，仙凡谐乐意情长。沥血呕心滋艺果，溢彩流香。

玉凤好衷肠，肝胆红装，相濡以沫美名扬。允武允文呈力作，再铸辉煌！

今年是粟司令百年诞辰。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看到他同我们一起在夜间徒步行军。他步履轻捷走在前面，他的坐骑往往只是跟在后面。他时时招呼年大体弱的同志骑上他的马，或把别人的背包让

牲口驮载。

我看到他正秉烛细细端详地图。他时而凝神深思，时而以铅笔或指引比画丈量。许多作战计划就是这样在图前形成腹案的。我们每到新的宿营地，总是

首先给他挂好满屋的地图。

我看到他正在山头上指挥。他蹲在掩体内一面用望远镜观察，一面用电话通话。当面就是敌占山头，对方的步机枪和迫击炮随时可以打到这里。我靠近他身旁，他的镇定自若感染着我大胆沉着。

我看到他把西红柿及其他

曾经有位同行问我：“你哪来那么多的构图，源源不断，难道没有画不出的时候？”我答道：“心有所思，手有所画。哪一天我停止思索了，就不会画了。”在十三岁那年，从世界名画明信片和画册上得到的对光影、色彩、美学的理解和感悟，以及想把这些理解和感悟用绘画记录下来、表达出来的那份冲动，至今都没有停止过，其间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

感恩亲人

彭鸣亮

当年在父亲的病榻前，父亲逐一为我讲解外祖父收集的名画明信片和大舅从国外带回的画册，由此我知道了除了墙上的宣传画和手中的连环画之外还有油画、雕塑等纯美的艺术领域。我想：“会画画那该多好啊！”从那时起，绘画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我的空间。终于有一天，父亲走了。生活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上来说都是艰难的，我只有在握起笔来画画时，内心才有一丝慰藉，仿佛父亲又来到身旁。正是由于父亲的启蒙，使我学画伊始就知道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也使我萌生了当一个艺术家的念头。于是，我的艺术生涯就此起航，而给我护航的正是我的外祖父和祖父。

我的外祖父，曾是律师和英语、历史教师，对于东、西方的文化艺术颇为爱好，当年大舅归国时带回的当时欧洲最新的画册，都由外祖父保存着。因此我每月都会从有限的零花钱中留存二角六分，为的是从徐汇乘车到虹口，去聆听外祖父说故事般的艺术史讲述，去翻阅高更、凡·高、塞尚的画册，当然这样的“艺术之旅”在当时是违禁的，只能在我们祖孙间悄然进行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旅程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涉及范畴越来越大，八大山人、齐白石和张大千进入了我的视野。记得当时外祖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作为一名中国人，是最富有的。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一门可以做一生的学问。”因此，我在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就非常注意东、西方两种文化领域的交叉探求，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而另一位使我得以坚持这种探求的人就是至今我仍然梦牵神萦的祖父。我的祖父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对晚辈有着深沉的爱，为了支援我母亲撑起这个家，更为了支持我学习艺术，祖父在八十高龄时，戒除了六十年的烟瘾，承担起日常的家务，给了我无言但却实在的支持，并以他独有的毅力和方式，为我确立了做人的道德准绳。正是有了祖父的支持，我得以每周六的下午到福州路去，在书店和美术用品商店里徜徉，每每以步行所省下来的车费买些纸或是笔回家。就是这样，在当时十分压抑的情形之下，我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却是愉悦地向着我的目标前行。每当此时，祖父就是我的第一位观众和评论家，尽管他的评论永远只有“好，好！”两个字，而我却每次都能从中看到不同的鼓励和希冀。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中学毕业后，我考取了既可继续学习艺术又可以领取助学金的上海工艺美校，每星期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给祖父看一周来我的习作。三年后我毕业踏上了与祖父同样的工作岗位。在教学之余，还去业余大学进修，在那里画人体，并到全国各地采风，开始创作自己的作品。正当我即将学有所成时，祖父却带着他九十三年历经坎坷的人生离我而去，留下了他永远的“好，好！”的鼓励。

我把对祖父的情感融入我的创作之中，更实在地汲取着来自马蒂斯、康定斯基和毕加索的艺术元素，一种表现自我的强烈愿望在心底升腾，创作的欲望与作品的产出成正比地增长着。终于，我以绝对自我的绘画元素，表达了绝对自我的艺术风格。（本文节选自《彭鸣亮画集》）



种子给大家。在部队整训期间，在整风生产两不误的运动中，虽然他的一只手是伤残的，却仍然和我们一起在田间锄地。

我的耳际响起他的嘱咐：“支部、小组开会，一定要通知我，你通知我不到，是我的责任。我要是有事不能参加可以向你请假。”在苏浙军区时，他的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小组。我这个小组长是个参谋，他虽然是位司令员，却完全以普通党员身份过组织生活。

明日请看《战地“青年剧团”记事》

十日谈

新四军中上海兵